

水木風雨，清華百年

• 唐少杰

清華的歷史有多長？現代中國的歷史有多長，清華的歷史就有多長。清華孕育於清王朝「遜朝」的前夜與中華民國「分娩」的黎明之際。清華誕生的1911年是中國現代歷史的起始年份。1930年代清華校友提出的「與國同壽」的校慶口號，今天看來遠遠不夠了，因為清華比中華民國的歷史更長。

清華的天地有多大？現代中國的天地有多大，清華的天地就有多大。放眼當今中國黨、政、軍、民、學，縱觀現代華夏東、西、南、北、中，清華的影響可謂無所不及。無論有形的還是無形的空間，清華都與現代中國相互包容。例如，海峽兩岸就有兩所同名的「清華大學」（北京海淀「清華」和台北新竹「清華」）。眾多中國大學在海峽兩岸同名的，這在整個中國僅此一例。北京清華與新竹清華，儘管同屬廣義上的清華，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發展途徑。本文涉及的是北京清華的問題。

一 清華的「發祥」

大學作為歐洲文明進入中世紀後期出現的一大碩果，迄今約有一千年

的歷史。大學隨着「歐洲化」或「西方化」普及、深入到世界其他地區，也以近代化、現代化的一種「普世」方式，成為人類數百年來教育發展的主力軍和科學進步的發祥地，特別是近百年來，更成為一個民族先進與否或一個國家發達與否的關鍵。作為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清華的孕育、形成和發展無疑是一百年前中國與外國之間的文化衝撞、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文明交流的產物。換言之，清華乃至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或確立，既不是純粹中國因素的使然，也不是純粹外國因素的油然，而是「華夷之辨」直至「華夷之變」的必然。

大學進入中國並在中國成長起來，表明了中國文化新紀元的來臨。中國進入近代和現代的歷史，包含了教育由傳統和本土到漸進開放和漸近西化的歷程。西方教育的介入和作用使得中國的教育發生了鉅變，而清華的孕育和出現表明了中國教育在東西交匯、中外砥礪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時代主流和社會趨勢，亦即大學及清華問題本身就凸顯了近、現代中國文化及教育所蘊含的東西文化雙重性的價值和中外教育雙重性的取向。

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清華的孕育、形成和發展無疑是一百年前中國與外國之間的文化衝撞、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文明交流的產物。清華乃至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或確立，是「華夷之辨」直至「華夷之變」的必然。

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學校」再到「清華大學」的百年歷程，既折射了西方大學制度及其理念在中國生根、開花和結果的過程，也展現了中國大學教育觀念及其實踐的生成、轉型和自主的過程。

毋庸諱言，美國對於清華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獨到的作用。緣起1900年(庚子年)事變而於1901年簽訂的致使清王朝氣數殆盡的《辛丑條約》中，美國獲得的賠款為2,444多萬美元(3,200多萬兩白銀)，此款項約佔「庚子賠款」4.5億兩白銀總數的7.8%，名列當時外國列強獲得賠款數目中的第六位。至1905年底，美國就獲得了上述賠款。在當時所有外國列強中，美國與中國的地理距離最遠，兩國關係起步較晚，但無論人們今天如何斥責美國懷有的是「文化野心」或從事的是「教育侵略」，作為最年輕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在當時比起其他所有列強的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它要開闢出與其他國家有所區別的對華關係。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軟實力」方面趕超其他國家的對華影響。

經過美國朝野上下以及不同人士的努力，1908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退款決議，決定將1,078.529612萬美元，從1909至1940年逐年按月地「退還」中國，用於在中國辦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這就是清華的直接由來。在當時美國眾多的對華退款建議中，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Edmund J. James) 1906年給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的信就最有代表性①：

中國正臨近一次革命……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青年中國人，那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得最大的收穫。……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使用那從知識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袖的方式。

清華的歷程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特別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發展的

一個縮影。清華先是帝國主義或準殖民主義文化與中國古老文化相結合的一個「怪胎」，後是中國人自己興辦大學、主導大學的一處「重鎮」。從「清華學堂」(1911)到「清華學校」(1912)再到「清華大學」(1928年至今)的百年歷程，既折射了西方大學制度及其理念在中國生根、開花和結果的過程，也展現了中國大學教育觀念及其實踐的生成、轉型和自主的過程。

二 百年清華的五個時期

回首清華百年歷史，筆者認為可以分為五個時期，每個時期都有其值得我們深切反思的特定內容或蘊涵。

第一個時期是1911年春至1925年春，可謂清華「史前期」。這一個時期清華沒有自己的特色，幾乎是美國大學文化在中國的翻版，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 1920年代初來華講學時，訪問過清華，他在答記者問時說，清華完全是一所美國化的學校②。但是，這一時期的清華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清華作為美國化的學校機構，既不同於中國傳統的學校及學堂，也不同於此一時期中國的教會學校。最為引人矚目的就是這個時期清華培養的眾多學子，日後留學美國等國，學成歸來，成為1920年代以來中國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專家甚至文化泰斗，如胡適等。二、在美國的部分庚款退還支持下，清華沒有遇到當時中國不少大學所出現的經濟拮据問題。清華有財力上的充分保證，這為其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第二個時期是1925年春至1937年夏，可謂清華「創世紀」。1928年清華改制，由「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這一個時期清華有兩大突破：

第一是1925年初，在清華過去的「初等部」和「高等部」的基礎上，亦即在為留美預科培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水平上，新建了「大學部」，清華已不再是單純給美國輸送預科學生，而是開始培養自己的大學生；第二亦即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同年清華建立了專門研究中國文化的機構——「清華國學研究院」，聘請了著名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招收志在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研究生。清華國學研究院不僅成為清華教育上的一大飛躍，甚至是清華學科史上的某種「絕唱」，而且也是中國二十世紀學術史、學科史和思想史的一個絕無僅有的「奇觀」。

這一時期清華還有兩件大事值得關注：一是1931年底，清華留美第一屆學生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經過他和清華同仁的努力，清華步入了中國著名大學、世界知名大學的行列，迎來了短暫的、僅有六七年時間的第一個黃金時期，亦即「崛起的時期」；二是1935年底，由清華學生發起的「一二·九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領導的全國性青年學生運動，這一運動為中共培養和輸送了不少幹部。儘管「一二·九運動」無法與「五四運動」（指五四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青年愛國運動）相提並論，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一二·九運動」比起「五四運動」更多地是一場救亡運動，也是後來中共學生運動的濫觴。

第三個時期是1937年夏至1946年初，可謂清華「西南聯大期」或「傳奇期」。這個時期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藉西南邊陲一隅，鼎力協作，眾志成城，保證了在抗日戰爭極為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既沒有使中國

的大學教育薪火熄滅，也沒有使中國的高等學術偃旗息鼓，更沒有使中國的林林總總的傑出人才告罄闕如。今天，這三所學校在各自校園所共同矗立的紀念碑上有銘文曰：「西山蒼蒼，南國蕩蕩，聯合雋彥，大學泱泱」，就是西南聯大作為當時中國大學首屈一指的楷模的明證。「西南聯大期」既是清華歷史的一個傳奇，使得清華教育流光溢彩，也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給後來的中國大學教育留下了難以言盡的思索和追尋。筆者總是在詢問：是甚麼、又是為甚麼包括清華在內的三所大學在民族危亡和祖國危難之際，辦起了並且辦好了西南聯大這樣一所卓越的大學，使得當時中國的大學沒有落伍於世界大學發展的水平主流呢？

第四個時期是1946年初至1948年底，可謂清華「復員期」或「過渡期」。這一時期也是清華歷史最短的一個時期。抗戰結束，清華復員北上，但由於國共兩黨的決戰提到了歷史議程，清華難以正常辦學。清華歷史開始進入一個根本性的轉折。

第五個時期是1949年至今，可謂清華「新時期」。這一清華歷史最長的時期又可細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至1966年夏、1966年夏至1976年底、1977年至今。這一與新中國六十餘年歷史幾乎同步的清華時期，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整治、折騰、動蕩，清華不斷地處在政治漩渦之中甚至處在政治風暴中心，後三十年基本上是休養、恢復、建設，清華駛入回歸大學角色和重建大學職能的航道。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這一時期對清華的今天和未來都關係至大，影響至深。

第一個階段：1949年至1966年夏的「十七年」是清華脫胎換骨的階段。

筆者總是在詢問：是甚麼、又是為甚麼包括清華在內的三所大學在民族危亡和祖國危難之際，辦起了並且辦好了西南聯大這樣一所卓越的大學，使得當時中國的大學沒有落伍於世界大學發展的水平主流？

清華對於文革的作用獨佔鰲頭，即清華成為一個從最高領袖到群眾、從中央到基層、從首都到全國、從大學到社會的獨一無二的「文革樣板」，成為一個有文革理論變異、有文革實踐創舉和有文革思潮新徑的「文革典型」。

清華不僅在政治上進入了中共政治絕對領導的歲月，而且在教育制度及其理念上進入告別歐美化、汲取蘇聯模式的時代。這一階段對清華命運和清華建設影響最主要的是：一、1952年全國高校的「院系調整」致使清華成為失去了文科、法科、理科、農科而只擁有工科的大學，這一調整給清華的學科結構和學科發展帶來了半個多世紀的負面後果，到今天都沒有使清華恢復元氣；二、1957年的「反右鬥爭」致使清華約571名師生員工被打成「右派」（約佔全校師生員工總數的5%多）^③。清華居於全國「反右鬥爭」的前列；三、1958年清華進行了三個多月的「教育革命」，這種革命可謂教育烏托邦實踐的個案，並與文革「教育革命」有着一定的歷史淵源；四、1964年清華幾近半數的師生員工下鄉從事某種文革預演的「四清運動」。此時清華如同全國一樣，愈來愈激進、偏執。

第二個階段：1966年夏至1976年底的「十年」是清華生死磨練的階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單位中，清華對於文革的作用獨佔鰲頭，即清華成為一個從最高領袖到群眾、從中央到基層、從首都到全國、從大學到社會的獨一無二的「文革樣板」，成為一個有文革理論變異、有文革實踐創舉和有文革思潮新徑的「文革典型」。清華在文革中的具體意義可以通過下列非凡事例來界定和顯現：

首先，清華提供了「紅衛兵」這個文革初始的生力軍和突擊隊。如果說文革在北京大學點火引爆，那麼它則在清華找到了殺向全國的衝擊波。清華能夠成為紅衛兵運動和組織的策源地，表明文革絕不是偶然的。

其次，清華是文革「無產階級司令部」戰勝「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前沿。通過「工作組問題」和「蒯大富問

題」，清華把文革最根本的問題，即群眾性問題無以復加地展現出來，把文革群眾與幹部的矛盾異常深切地揭示出來，進而把文革造反派運動推向一個極致，表明文革從根本上不同於以往中共的任何政治運動及群眾運動。

再則，清華帶來了結束文革群眾運動、終止紅衛兵運動和斷送造反派運動的契機。清華在文革頭兩年所出現的群眾論戰和分裂不但注定了文革的異化，而且鑄就了文革群眾的自我異化。清華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爆發的「百日大武鬥」實質上敲響了文革最初的喪鐘，拉下了整個文革初期歷史的帷幕。

還有，清華是文革「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從1970年開始，清華把文革最具有烏托邦「魅力」及其破壞力的「教育革命」推向全盤的實踐，這種「教育革命」嬗變為反知識、反教育、反文明、反現代性以及封建特權（「走後門」上大學）等等的大雜燴。

最後，清華是文革最後一場運動即「批鄧運動」的發源地。1975年劉冰、惠憲鈞、柳一安、呂方正四人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反映清華問題的事件，演變成了翌年鄧小平被再次打倒，促使文革走入了歷史的死胡同。

文革十年對清華意味着甚麼呢？這裏，僅用數字來回答：清華在文革中約有1,228名教職員工「被立案審查」（約佔教職員工總數的20%），178人被定為「專政對象」，58人「非正常死亡」，受傷人員數以千計^④。毋庸置疑，這一佔據清華歷史十分之一時間的階段是整個清華歷史中最為慘痛、最應銘記和最不該迴避的。

第三個階段：1977年至今的三十四年是清華長足進步的階段。相比較於以往的清華歷史，這三十多年是清華發展比較迅速、顯著和順利的時期，

特別是從1993年開始，清華的發展在2001年校慶九十年前後達到一個小高潮。

清華百年的歷史實際上是以清華在二十世紀的八十九年(1911-2000)為主幹的。無論是清華百年歷史，還是清華在二十世紀的八十九年歷史，筆者認為，真正屬於清華自身相對穩定、相對和平、相對持續發展的時間也就只有七十餘年，因為，日本侵略的「外禍」和文革的「內亂」至少使清華陷於二十年不止的動蕩和災難。顯而易見，屬於清華獨自享有的、彌足珍貴的時間實際上不足百年！質言之，清華的百年歷史既是中國大學百年變革的多重性的凝聚，也是中國精神百年進化的多維性的映照。

三 清華精神

清華百年歷史影響重大，意義非凡，這總會促使人們從思想意識層面去加以探尋、概括，諸如清華校訓、清華傳統、清華學風等等。筆者把這

些方面統稱為「清華精神」。那麼，有無清華精神？甚或是清華精神？這無疑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的問題。

梁啟超1914年冬天來清華演講，他引經據典對清華學子的殷切鼓勵，變成了今天人們耳熟能詳的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⑤。如同杜維明所言，這一校訓是所有的中國大學校訓中最富有內涵的校訓^⑥。有人把清華傳統概括為「古今貫通，中西融匯，文理結合，綜合創新」^⑦，有人把清華學風稱作「嚴謹、勤奮、求實、創新」等等^⑧，不一而足。這些都涉及到如何從精神的維度看待清華，也即從清華歷史引出清華精神、從清華精神來把握清華歷史的問題。

如果說大學校訓是大學精神的生動體現，那麼大學傳統、大學學風等則是大學精神的內在凝聚，由這些方面所構成的大學精神是一個綜合體，即大學精神既是大學辦學的固有機制和根本理路，又是大學治校的特定目的和基本取向。但是，對於清華精神而言甚至對於整個清華大學而言，由於百年歷史的多變和曲折使得清華不

清華精神的多變甚至脆弱，無疑會制約着清華文化的積累和清華底蘊的延續。不僅清華百年歷史的五個時期有着深刻的差異，而且清華前四十年的歷史與後六十年的歷史也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有過相互的抵牾或隔閡。



清華及其歷史的標誌性建築物——「二校門」。

清華精神是歷史的、具體的和多樣的，在清華早年所獨立特行的精神或其某些因素，由後來某個清華歷史階段所否定、所拋棄之後，又有可能被重新認識、重新確立甚至重新弘揚。清華校訓之經歷就是一個例證。

可能有一成不變、持續穩定、牢固深化的清華校訓、清華傳統、清華學風，因而也就給清華精神帶來了在上述五個不同時期的不同風貌和不同蘊涵^⑨。以清華校訓為例，在1949年之前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在1949至1966年變為「又紅又專」，即政治上的「紅」和業務上的「專」；文革年代又變為遲群所說的「清華大學只有一個專業，這就是鬥走資派的專業」；1977年之後，有人批評以工具主義的方式把清華校訓詮釋為「聽話、出活」^⑩；直至1996年之後，清華才逐漸肯定和重新確立最初的清華校訓。

清華精神的多變甚至脆弱，無疑會制約着清華文化的積累和清華底蘊的延續。由上所述，不難發現，不僅清華百年歷史的五個時期有着深刻的差異，而且清華前四十年的歷史與後六十年的歷史也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有過相互的抵牾或隔閡。即使是在同一時期，例如清華在1949年之後至今的那三個階段之間的相互對立也頗為明顯。具體地說，清華文革階段對清華文革前的階段的否定、清華文革後的階段對清華文革階段的排斥已是不爭的事實。

清華精神的流變及其凝重還特別體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和下半葉清華兩位著名校長不同的大學教育理念及其實踐上。

帶領清華崛起的梅貽琦校長所倡導並且奮鬥的是：一、通才標準。這是清華培養學生的標準，亦即「自由教育」(liberal arts，又稱「博雅教育」)的標準；二、教授治校。這是清華治校的原則及其運作機制；三、學術自由。這是清華辦學的理路和氛圍；四、大師辦學。這是清華辦學的宗旨和目標。梅校長那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

也！」^⑪應該視作清華精神的雋永神韻和最好定位。筆者認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有兩個大學校長居功至偉：一是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開風氣之先」，另一個就是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落建設之實」，即梅校長比較成功地把現代大學制度及理念貫徹、落實到清華。1948年底，梅校長離開清華出走海外，這與其說是梅校長本人的挫折，不如說是清華精神的一次裂變。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清華歷史上無出其右的蔣南翔校長給清華帶來的主張和舉措：一是堅持中共黨的政治領導，保證清華的政治方向，建立「學生政治輔導員」制度^⑫；二是堅持「又紅又專」的人才標準，確保清華學生在政治上和學業上的雙項合格；三是堅持教學、科研和生產的「三結合」原則，使清華具有多種職能；四是堅持以質量為主、以數量為輔的策略，保證清華穩步發展。蔣校長更多地是一位「政治校長」，他作為1949至1966年「十七年」中國大學教育模式「第一人」，在今天的清華依然發揮着影響，例如，清華的幹部隊伍一度就被喻為「沒有蔣南翔的蔣南翔隊伍」。文革的來臨以及在清華的得勢，這與其說是蔣校長本人的失敗，不如說是包括清華在內的「十七年」大學教育模式的潰敗。

清華精神是歷史的、具體的和多樣的，它彷彿在清華那不可能一以貫之或始終如一的百年歷史中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即在清華早年所獨立特行的精神或其某些因素，由後來某個清華歷史階段所否定、所拋棄之後，又有可能被重新認識、重新確立甚至重新弘揚。上述的清華校訓之經歷就是一個例證。雖然人們不可能對清華精神有着一致的理解，但是清華百年歷史的業績還是孕育出並且聚集着為清華所特有的、所不斷前

行的精神。今天的一些清華人把清華精神主要概括為「明恥與自強」、「獨立與會通」、「科學與實幹」三個方面^③，筆者認為這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即使是這些方面及其內在關係也在不斷地得以闡釋、充實和升華。

「明恥與自強」是清華精神的動力。清華在時間上的形成和空間位置上的確立都滲透着近代中國以及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清華數代學人沒有在這個「恥」面前退卻、萎縮和沉淪，而是發憤圖強，自強不息，把一所「留美預科班」學校改造成了中國數一數二的著名大學，這是中國大學的榮耀，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不過，總令筆者感慨不已的就是清華辦學的最初動機與清華的後來及現狀之間的差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獨立與會通」是清華精神的理路。清華的成長顯然是中國人辦大學的一個比較成功的嘗試，正如馮友蘭所言：「清華大學的成長，是中國近代學術獨立自主的發展過程的標誌。」^④這種獨立主要是指清華在歷史上對於美國文化的獨立關係，還不是人們所更加注重的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而這種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對於清華來說依然是有待努力、有待奮鬥的目標。清華要建設自己的學科大業，就不可能在西方化或美國化上徘徊游弋，也不可能在復古維舊上抱殘守缺，而在中外、古今、文理三大關係上加以「會通」，即會合變通，就有可能使清華趨向現代的、多元開放的和世界性的大學。

「科學與實幹」是清華精神的方法。朱自清說過：「清華的精神是實幹。」^⑤長期以來，清華學人保持和發揚的是「科學救國」、「實幹為民」的作風，一度被視為「紅色工程師的搖籃」，一度在毗鄰的北京大學喊出「振

興中華」的時代口號而隨即提出「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務實主張，等等，這些「科學為本」和「實幹為先」的精神都為清華的崛起和發展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碩果。然而，相比較於中國其他優秀大學所具有的精神，清華精神有着濃厚的、過重的科學主義氣息。問題在於：清華作為中國有着較為強烈的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和實用價值氛圍的高等學府，清華精神應該如何不斷地通過人文主義、理想主義和普世價值的精神來加以會通或互補？以王國維當年所期望的科學主義（「可信的」）與人文主義（「可愛的」）之間的協調與融合，如何來使清華「更上一層樓」實現既可信更可愛的統一？

清華精神現今缺失的是甚麼？這與清華現今的狀況有着密切的關係。1993年，清華大學新一屆領導班子決定：在清華建校百年之際，把清華建成世界一流大學。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這一決定演變成了中共黨和國家政府決定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把十一所（後來變成二十餘所）中國大學辦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稍後就是中國大學界著名的「211工程」的實施。然而，十多年過去了，不僅中國還沒有世界一流大學，就是清華領導層也把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間表推遲到2020年，並規劃用三個九年（1993-2020）的時間來把清華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清華急於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但很有可能不會適時如願。關鍵在於，清華是否具備了世界一流大學的精神？具體地講，清華精神所缺失的恰恰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精神！

清華領導層在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時並沒有也不可能對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作出規定或明示。這有點類似於胡適於1947年9月發表〈爭

清華領導層規劃用三個九年（1993-2020）的時間來把清華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清華急於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但很有可能不會適時如願。關鍵在於，清華精神所缺失的恰恰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精神！

由於種種原因，不僅僅是清華大學在迄今為止的六十餘年裏沒有出現過大師，而且所有的中國大學在這過去的六十餘年裏也沒有培養出大師級的人才，就如錢學森在晚年所發問的：「為甚麼我們長期缺乏傑出人才」。

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的談話時提出過爭取十年建立五所、十所「第一流大學」^⑥，但對「第一流大學」的標準卻語焉不詳。雖然人們對於何謂「世界一流大學」不可能作出一致的、公認的評定，但是世界一流大學至少應有三個「底線」：世界一流的教師、世界一流的學生和世界一流的校長（廣義上的大學管理職員及體制）。只有這三者形成鼎足之勢，才有可能真正造就出世界一流大學及其風範。

一些人評價清華時總是看重從清華走出了諸多中國著名的政治領導人（「大官」）、實業家及金融家（「大款」）、社會名流如體育和影視明星（「大腕」），儘管這些人物的出現確實是清華成就的多種體現，但絕不是清華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定位所在。毫無疑問，一所大學是否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要「指標」，不在於其有大官、大款、大腕，而在於其有世界一流大學的精神，特別是在於有生成、保持和發揚這種精神的大師。套用梅貽琦校長的名言：「世界一流大學者，非謂有大官、大款、大腕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因為，大官、大款、大腕完全可以為非一流大學或者非大學的機構所培養出來，而大師者，只有通過一流大學才能最終確立起來。

由於種種原因，不僅僅是清華大學在迄今為止的六十餘年裏沒有出現過大師，而且所有的中國大學在這過去的六十餘年裏也沒有培養出大師級的人才，就如錢學森在晚年所發問的、令人深思不已的「錢學森問題」（即「為甚麼我們長期缺乏傑出人才」）。「沒有大師」這一事實或「缺失大師」這一現象的重大作用和深遠影響絕不限於一代人的歷史，而是波及到數代人的歷史。概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

來沒有出現大師、沒有造就大師，這說明了甚麼呢？

何謂「大師」？大師不只是一流大學的「標竿」，最主要、最重要的是大師之所以為大師就是其對於思想、科學、文化的創造性變革和開拓性促進，並由此而帶來的對於人類生活的造福和社會歷史的推動，不是限於地區的、民族的、暫時的和某一大學及某一學派的，而是世界的、人類的、持久的、跨大學的及超學派的，也就是說，大師是對於思想、科學和文化作出了世界級的、世紀性的成就和貢獻的傑出人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⑦，大師之道就是大師精神。

世界一流大學的精神重在大師精神。今天，從整體上而言，清華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學生，但沒有世界一流的教師和世界一流的校長（廣義的）。面對人們提及清華在當今中國是「英才半國，名師薈萃，學子莘莘，人傑輩出」等評價時^⑧，更應看到清華還沒有世界頂級的大學教師和學術流派，還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學科及相關專業，從總體意義上還沒有取得世界尖端的教學與研究的成就或業績，還沒有達到世界領先的大學教育的成果和效益，教師和校長（廣義的）還處在由過去的或傳統的士、文人、學者、教書人、專家到可能的或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份子」和「獨立知識份子」的轉變過程，距離由知識份子之中產生出思想大師、科學大師、文化大師直至教育大師等還相當遙遠。

例如，六十餘年來，清華沒有雄厚而深重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傳承，沒有開創性的、普世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沒有培養出自己的思想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教育學家、宗教學家、倫理學家、邏輯學家、美學家、

心理學家、語言學家、政治學家等人才。沒有對清華異常稀薄的人文學科所具有的異常豐富、厚重和珍貴的人文資源進行應有的開掘和提煉，不能不給清華歷史留下了空白，不能不給清華精神造成了缺憾。

如果說一個英明的大學校長是一流大學的「靈魂」，那麼諸多優秀、卓越的大學教師就是一流大學的「骨骼」，而眾多出類拔萃的大學學生就是一流大學的「血脈」。世界一流大學不可能是「形象工程」的產物或「政績工程」的結果，而應該是閃耀着「至真、至善、至美、至聖」及其相互統一的一流「大學精神」的精髓乃至偉大「時代精神」的真諦，更應該是對於全人類和全世界作出劃時代的思想貢獻、科學發明和文化創造的一個「大本營」。

總之，追溯清華歷史和探尋清華精神，則是由於清華在當今中國大學的特殊地位以及它肩負的責任和使命所致。因而，筆者要把清華大學譽為「中國大學的王子，中國希望的眸子」。清華百年校慶之後，清華歷史能否欣欣向榮，清華精神能否蒸蒸日上，讓我們翹首以待。

註釋

- ① 轉引自清華大學校史組編著：《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
- ② 聞奇、周曉雲編著：《清華精神九十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頁10。
- ③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九十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頁212。
- ④ 參見唐少杰：〈清華大學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年2月號，頁56-64。

- ⑤ 黃廷復、賈金悅：《清華園風物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頁3-4。
- ⑥ 杜維明在清華大學哲學系建系85周年及復系1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致辭，2010年5月15日。
- ⑦ 徐葆耕：〈自序〉，載《紫色清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頁1。
- ⑧⑨ 出自清華有關老師的講演。
- ⑩ 清華學長王鐵藩（鐵凡）在清華校慶九十年前夕所寫的〈清華有傳統嗎？〉一文，對這個問題做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參見王鐵藩轉給筆者的電子文本打印稿，〈清華有傳統嗎？〉，2001年3月8日定稿。
- ⑪ 徐葆耕：《紫色清華》，頁145。
- ⑫ 劉述禮、黃廷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10。
- ⑬ 蔣南翔1953年元旦正式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之後，決定建立「學生政治輔導員制度」，即為清華每個學生班級配備「政治輔導員」（與每個學生班級「班主任」相並列，這一體制有些類似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部隊的「軍事首長」和「政治首長」共同負責制），從學生中選拔出管理學生的「政治輔導員」，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又稱「雙肩挑」學生幹部。至1966年初，清華共出現了618名學生「政治輔導員」，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中共黨和國家領導幹部，如胡錦濤、吳邦國等。
- ⑭ 參見徐葆耕：〈清華二題〉，載丹好選編：《人在清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45-46。
- ⑮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308。
- ⑯ 徐葆耕：〈序：大學精神與清華精神〉，載《清華精神九十年》，頁4。
- ⑰ 參見王昊：《近代中國大學校長的文化選擇》（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頁30。
- ⑱ 韓愈：《韓昌黎全集》，卷十二，〈師說〉（北京：中國書店，1991），頁185。

世界一流大學不可能是「形象工程」的產物或「政績工程」的結果，而應該是閃耀着「至真、至善、至美、至聖」及其相互統一的一流「大學精神」的精髓乃至偉大「時代精神」的真諦。